

# 塑造数字新农人： 农民数字化转型的驱动逻辑

王杰<sup>1,2</sup>, 梅良豪<sup>2</sup>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2.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建好数字乡村的应有之义。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由传统小农向数字新农人蜕变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不变的是农民现代化的本质和逻辑,变化的是不同维度的特征凸显。具体而言,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维度看,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内在要求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从而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适应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和接续推进农民现代化。从历史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农民组织化走向农民职业化、迈向农民数字化的历史演进历程,遵循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引。从实践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数字下乡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等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牵引推动。以上三重驱动逻辑,其共性的指向都是塑造数字新农人。

**关键词:**数字新农人;数字化转型;驱动逻辑;乡村数字化;农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5)02-0009-11

##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未来发展的应然形态,也是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新时代推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作出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对“十四五”期间数字乡村发展作出规划部署并提出了政策要求。《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亦要求“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数字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民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广泛群体。从乡村建设实际来看,农民数字意识、数字技能、数字知识等尚且不足,有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数字经济需要驱动和实现农民数字化转型。

建设数字乡村,既包括数字领域视角下的数字经济、数字生态、数字文化、数字生活、数字治理等维度<sup>[1]</sup>,又涵盖“三农”视角下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数字化转型。当前,学界关于农民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主要从两类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

1.“结构-制度”视角。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典型特征,也是国家根据阶段性国情实际需要为了推动资本积累、民族振兴作出的制度安排<sup>[2]</sup>。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之间要素流通不畅、收入差距拉大、资源配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sup>[3]</sup>,这些问题的集合久而久之形成了城

收稿日期:2024-04-23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5.0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CKS024);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2E02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Z1090121077)

作者简介:王杰,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乡鸿沟<sup>[4]</sup>。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鸿沟的数字化表现。城乡数字鸿沟导致城乡之间长期存在数字不平等,农民面临数字贫困等问题<sup>[5-6]</sup>。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必须实现农民“数字脱贫”,着力解决农民数字贫困问题。有研究认为,农民数字贫困从个体性因素来看,是因为缺乏数字能力,包括参与数字活动必要的经济基础、智力水平和数字意识<sup>[7]</sup>;从结构性成因来看,是因为经济、社会、信息、政治等资本要素匮乏导致的<sup>[8-9]</sup>。还有学者提出,农民数字贫困亦与市场、社会性因素制约有关<sup>[10]</sup>。因此要实现农民“数字脱贫”,必须从个体、结构、环境等方面统筹兼顾。为了更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桎梏,近年来国家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为此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大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和提高农民社会福利以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目标追求<sup>[11]</sup>;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驱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sup>[12-13]</sup>;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容和过程,积极构建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以技术赋能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sup>[14-15]</sup>。然而,这些制度安排要顺利落地,需要以农民的数字化转型作为基础和条件,通过强化培育农民的数字技能、思维能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人力资源基础<sup>[16]</sup>。

2.“行动·能力”视角。建好数字乡村,需要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凝聚行动共识,融洽合作关系,协调一致行动<sup>[17]</sup>。基层党组织、政府、农民、村社组织等构成了数字网络的行动主体<sup>[18]</sup>。作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些行动主体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公共活动。然而,由于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数字治理能力有限,多元主体的行动并不一致,往往还存在着主体间冲突<sup>[19]</sup>,这些冲突贯穿数字乡村建设过程,表现在主体观念和行为等层面<sup>[20]</sup>。从农民视角来看,之所以冲突和矛盾存在,与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参与的主体性不强密不可分<sup>[21]</sup>,究其原因,多是因为当前农民普遍数字能力不高、数字技能相对匮乏、数字知识储备不足<sup>[22]</sup>。因此,提高农民数字素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民数字素养是农民运用数字知识、能力和意识的综合体现<sup>[23]</sup>。有学者认为,可以运用“通用-社交-创意-安全”四维框架来测度农民数字素养<sup>[24]</sup>;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包括娱乐、学习和商业维度<sup>[25]</sup>。农民数字素养作用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机制在于能够激活乡村数字互动关系统,在优化结构和要素配置的同时持续生发内生动力<sup>[23]</sup>。研究认为,提升农民数字素养需要着力加大对农民的互联网知识培训,积极改善数字环境,扫除农民的数字信息获取障碍,鼓励党政、学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民数字教育,建立健全农民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特点、需求和习惯<sup>[25-27]</sup>。整体而言,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数字化转型成功,既需要转变思维认知方式,还需要变革行为行动模式,尤其对于农民个体心理情感的不确定性因素要高度重视<sup>[28-29]</sup>。

“结构·制度”视角从宏观环境层面阐明了农民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可行性,“行动·能力”视角从微观主体层面探究了农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制约瓶颈及其策略方式。尽管两类视角对于理解何以实现农民数字化转型、何以推进农民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大有裨益,但是仍然对农民缘何需要数字化转型的问题研究存在空缺。换言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数字化转型,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在何种作用力下进行的,这些问题尚有待于通过诠释农民数字化转型的驱动逻辑予以进一步回答。

本文认为,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由传统小农向数字新农人蜕变的过程。转型过程中,不变的是农民现代化的本质和逻辑,变化的是不同维度的特征凸显。传统小农,在农业生产意义上往往代表效率低下、方式落后,具有孤立、分散的典型特征;在行动组织意义上,传统小农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家户特征明显;在社会生活意义上,传统小农生活滞后于国家现代化生活节奏,具有“闭塞、落后”特征;在乡村文化意义上,传统小农文化往往是“低品位、低审美”代表;在乡村治理意义上,传统小农缺乏参与意识,也缺少参与能力,乡村公共事务往往陷入集体行动困境<sup>[30-33]</sup>。有异于传统小农,数字新农人是现代化农民的具象表达。在农业生产意义上,数字新农人受惠于数字生产工具和数字技术,具有市场化、分工化、集约化的典型特征;在行动组织意义上,由于数字技术为农民组织化提供了路径和机制,因此,数字新农人更易产生集体行动,集体化特征更加突出;在社会生活意义上,由于数字应用逐渐成为当前农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数字新农人在生活上具有“数字化”特征;在乡村文化意义上,数字新农人通过数字应用平台促进了乡土文化和文化市场的融合互嵌,成为国家文化市场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治理意义上,借助数字技术,数字新农人能够更好发挥主体性作用、提升治理效能。驱动传统小农向数字新农人蜕变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有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辑,无论哪一重逻辑,其共性的指向都是塑造数字新农人。从理论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历史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始终遵循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引;从实践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受到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牵引推动。通过系统阐释“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下的农民数字化转型驱动逻辑,有助于理解国家缘何需要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问题。

## 二、理论维度: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从理论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诉求:一是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二是治理迈向精准,乡村治理行动应当适应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三是主体视角下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这些理论诉求的实现,均以塑造数字新农人作为关键条件。

### (一)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必须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又称数字差距,是对数字技术在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过程中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理论概括<sup>[34]</sup>。城乡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数字技术资源占有及其应用效能上存在明显差距。聚焦中国情境,可以看作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数字化社会的表现和延伸<sup>[35]</sup>。依据数字技术接入可及性和运用差异,将城乡数字鸿沟划分为“接入-应用”二维框架进行审视<sup>[36]</sup>。

1.从接入鸿沟来看,城乡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在城乡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方面存在差距。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3年我国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量约为1.42亿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仅约为0.47亿户,两者之比约为3.02:1;2022年,我国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增加到4.14亿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增加到1.76亿户,两者之比约为2.35:1<sup>①</sup>。尽管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十年间增加了3.74倍,城乡数量之比亦有所缩小,但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根据《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的工作目标,“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1.9亿,5G网络基本实现乡镇级以上区域和有条件的行政村覆盖”。这说明,尽管5G网络覆盖了绝大多数乡镇镇区,但是行政村却依然难以有效覆盖,尤其是通信设施条件较差的农村,城乡差距明显。在传统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方面,以公共服务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为例,不少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广人稀、人才匮乏、资金不足等因素,在智慧物流、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差距明显。例如,多数快递企业并未在行政村及以下农村基层设置网点,服务人员少,配送效率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较低,服务资源的数字供给不足,承载公共服务的数字平台缺失亦或者效能低下。

2.从应用鸿沟来看,城乡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对数字设备的使用及其能力差异。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推动下,“数字经济”日趋繁荣,互联网普及,居民对数字设备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数字设备的使用能力提升也更加关键。关于城乡居民数字设备的使用情况,根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为7.5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1.1%;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人,较2021年12月增长2371万人,占网民整体的28.9%,城乡网民数量差异较大。同时,报告显示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数据分析表明,乡村居民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设备的利用程度与城市居民相去甚远。统计显示,乡村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在于数字设备不足导致的接入困难和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使用技能导致的应用困难。聚焦于未成年网民,虽然在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上城乡已经基本弥合,但是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偏爱和质量却依然差异明显。相对而言,乡村未成年网民使用更倾向于休闲娱乐而非学习资讯,且更少受到家长管制<sup>②</sup>。这些均表明,城乡居民使用数字设备存在明显的能力和素养差距。

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旨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一般意义上,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相应的现代性特征<sup>[37]</sup>。乡村数字化是现阶段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特征呈现,建成数字乡村是中国式

①数据来源于《2013年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2022年通信业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②参见《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乡村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因此,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必须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应有之义,以塑造数字新农人作为转型目标,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农民数字知识、技能、素养持续提升和强化的过程。转型而成的数字新农人数字能力得以增强,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应用鸿沟,提升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效能,进而逐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 (二)适应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基础和保障。为了维系乡村善治以推动现代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范式根据治理情境、任务的客观需要生发了适应性变革,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从“简约治理”迈向“精准治理”。

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范式,简约治理由来已久。在传统社会,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具有半正式行政的突出特点,受“无为而治”理念的影响,主要依靠以乡保、村长等准官员作为治理主体来化解矛盾纠纷<sup>[38]</sup>。这种“集权的简约治理”范式既保持了地方官僚机构的简约状态,又让基层自治得以维系<sup>[38]</sup>。简约治理延续至今依然有效运转,是因为受完全正式治理不可能定律影响<sup>[39]</sup>,同时乡村“熟人社会”的特性并未消失,乡村场域内的准官员仍然能够运用“化公为私”“公缺私补”等治理术和人情、面子等地方共识实现治理有效<sup>[40]</sup>。当然这也与国家财政能力有限、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相对稳定密不可分<sup>[41]</sup>。与传统简约治理不同的是,现代简约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积极治理范式,通过“包村制”“工作组”“行政嵌套自治”等具体实践呈现<sup>[42-43]</sup>。现代简约治理具有制度简约、目标简约、权力简约等基本特点,也延续了传统简约治理的人格化、自主灵活特性<sup>[42-43]</sup>。依据奥卡姆剃刀原则,简约治理推崇化繁就简、以简驭繁,追求简而不少、简而高效<sup>[39,44]</sup>。然而,简约治理并非总是有效。伴随资本下乡<sup>[45]</sup>、数字下乡<sup>[46]</sup>、监督下乡<sup>[47]</sup>、干部下乡<sup>[48]</sup>等治理情境的变化,乡村治理的内容、目标、主体、方式趋向复杂化、多元化。面对复杂情境和战略任务,简约治理很难实现治理高效能,精准治理应运而生。

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精准治理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高频词汇<sup>[49]</sup>,公共治理的精准化探索上升到顶层设计层面<sup>[50]</sup>,公共政策从此进入“精准时代”<sup>[51]</sup>。所谓精准治理是指为了破解公共治理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更有针对性、更加精确、更加清晰的靶向治理,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sup>[52]</sup>。由于得到数据科学和信息科技的加持,精准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问题<sup>[52]</sup>,尤其对于公共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和群体性事件中的预防、处置、追责等问题具有回应性、适用性<sup>[53-54]</sup>。精准治理重视精准选择治理主体、精准识别治理对象、精准评估治理效能<sup>[55]</sup>,具有可预知、可跟踪、可测量、可标准化的特点<sup>[56]</sup>,是后小康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趋势<sup>[57]</sup>。数字治理指的是以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的治理行为<sup>[58]</sup>,数字治理是精准治理的基本实现方式。乡村数字治理意味着运用数字技术对乡村数字空间、数字信息等要素进行治理<sup>[59]</sup>,标志着智治主义成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sup>[60]</sup>。在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升数字治理效能需要持续推动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61]</sup>,然而,当前乡村基层却出现了“数字形式主义”<sup>[62]</sup>,数字治理徒有其表导致数字赋能变成了数字负能。研究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可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sup>[63]</sup>。面对农民数字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推进农民数字化转型是乡村治理的当务之急。一方面,农民数字化转型可以健全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转型而成的数字新农人与基层政府、镇村组织、乡贤能人等合作共治,能够推动数字治理体系框架的系统化、完整化、协同化。另一方面,农民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相对传统农民,转型而成的数字新农人在数字知识、技能和素养等方面有了质的跃升,能够协助基层党政组织、社会组织提高获取数字、分析数字和运用数字的质量和效果,进而提升乡村数字治理能力。

## (三)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农民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组成、重要体现和应有之义。农民现代化指向农民的全面发展,包括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能力素质的现代化。农民数字化是当前农民现代化的阶段性体现。

1. 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思想观念根植于社会实践,并由社会实践决定,但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实践行动的向导指引各项活动。因此,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积极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趋势。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主要是强

化农民的数字思维。也就是,面对乡村数字化的现实境况,提升农民的数字敏感性,自觉从数字视角认识、理解数字乡村、数字社会,运用数字工具和方法发展数字生产,参与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进而塑造数字发展观、价值观、行动观。

2.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人们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前提是通过发展生产以存在生活。生产方式由生产主体、形式、条件等要素构成,是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决定社会现代化水平进而决定社会现代化的性质和面貌。生产方式现代化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型。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强国必须大力推进生产方式现代化。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农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主要是日常生产劳作的数字化,这包括生产力的数字化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数字化调整。例如,新型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新职业。这些数字化变革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生产运作效率,而且催生了乡村产业新业态,推动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

3.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包括生活主体、形式、条件等要素。广义的生活方式是一切生活活动的典型方式和特征的总和,包括政治生活、消费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sup>[64]</sup>。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指的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sup>[64]</sup>。生活方式现代化是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型,实现美好生活,提升生活品质必须积极转变生活方式。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主要是融入、创造数字生活。例如,参与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创作数字文艺作品,进行数字消费,享受数字服务(科教文卫医)等。

4.能力素质的现代化。从唯物史观来看,没有能力素质的现代化,就没有生产力进步和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就没有人的现代化。能力素质是人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sup>[65]</sup>。系统地看,能力素质现代化是人的体力、智力整体综合提升、释放的过程,而非某一维度的片面强化。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农民能力素质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包括但不限于农民在数字环境中进行数字生产生活,维护个人数字安全,开展数字社交、数字创作以及解决数字问题和运用数字工具等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三、历史维度:遵循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引

从历史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遵循了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历史进程中,国家始终重视农民现代化发展问题。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了传统小农向生存型农民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开始推动农民职业化发展,实现了生存型农民向专业型农民的转型。目前,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专业型农民的数字化发展,积极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塑造数字新农人是当下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步骤。

#### (一)农民组织化:传统小农转向生存型农民

农民组织化的历史目标是实现传统小农向生存型农民的转向。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还地于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此后,党带领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土地所有制得以建立,农民主体意识被唤醒,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sup>[66]</sup>。然而,要确保农民有效生存和生产力切实发展,仅仅革新土地制度还不够。

农民获得土地之后,既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又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sup>[66]</sup>。小农个体生产不仅无法使农民摆脱贫困,而且难以提升农村整体生产力<sup>[67]</sup>。因此,必须走农民组织化路径,实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发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农民组织化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组织形式,带有临时性、季节性特点;二是常年的互助组,这一形式组织化程度比劳动互助更高,有简单的生产计划、把劳动互助和提高技术相结合,形成了一定积累;三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形式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便于统一计划土地经营和发挥劳动分工积极性,能够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伴随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民逐渐认识到集体劳动、共同生产的优势,农民组织化程度持续提升,加快了传统小农向生存型农民的转向。

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需要效率更高、规模更大的组织模式,人民公社便是当时的时代产物<sup>[68]</sup>。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组织化主要围绕建立人民公社组织展开。人民公社既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单位。作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其组织化程度、规模高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通过“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形式,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民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组织。为了有序发展,人民公社坚持“勤俭办社、民主集中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并积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尽管这一“急行军”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令后人诟病,但是在更大范围上实现了组织农民更高程度地整合了乡村社会。

## (二) 农民职业化:生存型农民迈向专业型农民

农民组织化的历史目标是实现生存型农民向专业型农民的转向。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此后,党和国家的政策注意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向城市倾斜。然而,到了 21 世纪初,城乡差距愈加增大的现实又让党和国家意识到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消解二元格局,由此,新农村建设应运而生。聚焦农民视角,主要是促进农民职业化发展。

纵观新农村建设时期,为了促进农民职业化,党和国家的政策注意力从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向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和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逐步跃迁。新农村建设初期,党和国家首先关注农民职业技能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较长时期政策注意力聚焦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劳动力市场分工更加明确,农民缺乏就业能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推动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亦必须强化农民专业技能。政策内容上,主要围绕强化农民培训展开,尤其是注重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技能培训,突出农业科技教育、先进实用技术教育,强调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培训,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大幅增加农民培训财政投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了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党和国家继而关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有文化,指的是农民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政策内容主要围绕发展农村农业教育展开,包括扫除青壮年文盲、持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积极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懂技术,指的是农民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素质。政策供给接续加强农民职业技能的推进,更加突出职业技能的实用性导向,注重培养技能服务型等农村实用人才。会经营,指的是农民具有较高的运营管理素质。政策措施聚焦形塑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注重提升农民市场意识和集约经营水平,积极培育经纪人等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政策注意力在前序基础上的深度优化配置,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大政策力度,例如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二是拓宽政策广度,例如实施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三是上升政策高度,例如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四是重视政策效度,例如落实同工同酬政策,建立长效机制。总体来看,新农村建设时期促进了农民职业化发展,实现了生存型农民向专业型农民的转向。

## (三) 农民数字化:培育新时代数字新农人

根据历史逻辑的接续演进,当前农民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培育新时代数字新农人。为了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党和国家在新农村建设基础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聚焦农民视角,就是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实现专业型农民的数字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了驱动农民数字化,加快建设数字乡村,党和国家对此增加了政策注意力分配,强化了政策供给。不仅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和要求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而且先后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本。政策内容主要围绕数字乡村建设需求展开。一是强化农民数字素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组织农民学历教育,发展乡村“互联网+教育”,注重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数字农具”使用能力,提升农民数字科学素养和数字技能素养,尤其是加强妇女数字素养教育与技能培训。二是支持农

民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数商兴农”行动,增加数字产业设施设备应用供给,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升级,用好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赋能产业振兴,推动数字物流、农村电商发展。三是优化农民数字服务供给。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地区延伸覆盖,建设农业农村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交易数字化服务平台,依托信息流激活农村资金、物资等要素资源,持续开拓数字服务的乡村应用场景。四是丰富农民数字生活。顺应农民美好生活向往,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生活深度融合,促进生活方式和社区建设智慧化,丰富数字生活场景,强化数字助老助残。五是鼓励农民建设数字文化。以“互联网+”作为抓手,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以数字化方式传承和创新乡村优秀文化,建设“数字农家书屋”等乡村数字文化阵地,提升农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支持农民创作优质网络文化内容,以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六是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推动“互联网+社区”向乡村延伸,依托数字技术形塑乡村数字治理空间,提供农民诉求反映的数字渠道,借助数字空间,促进乡村治理的信息要素渠道和社情民意畅通,以数字赋能推动乡村善治。总体来看,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专业型农民的数字化发展正在积极推进,农民数字化转型尚未完成,但朝向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亦取得一定效果,新时代数字新农人逐渐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 四、实践维度: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牵引推动

从实践维度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受到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牵引推动。一是数字下乡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即通过优化当前乡村建设中的数字底座,为其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奠定物质基础。二是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也就是通过数字赋能产业振兴,运用数字技术撬动产业链条整体联动,增进城乡共同富裕,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三是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亦即通过数字赋能治理服务,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促进乡村治理与服务的现代化。塑造数字新农人是完成这些乡村数字化变革的内在规定。

##### (一) 数字下乡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1. 数字下乡是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第一步。数字下乡出现于精准扶贫时期,为了实现精准脱贫,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破解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不准确的现实问题,国家大力推进建档立卡,建立扶贫信息系统,将扶贫信息数字化、系统化、逻辑化,促进了农村贫困人口识别、帮扶、评估的精准化,显著改善了贫困治理效果<sup>[69]</sup>。为了更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开始实施,数字下乡在更高要求、更大力度、更广范围下继续深入推进。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是当前数字下乡的第一工程。一是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数字底座优化升级,即对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主要有两个方面:网络基础设施主要是改进农村数字网络建设,包括推动电信网络、广播电视网络向行政村延伸,优化农村宽带网络质量和覆盖深度,实现管道、机房等基础性通信设施的共建共享,优化乡村光纤网络承载能力,提高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主要是改进利用信息技术为农村居民提供政务、生产、生活等领域信息服务的站点和设施的建设。优化乡村政务服务的数字平台和信息质量,推动涉农政策宣传、推送、查询便农化;优化乡村生产服务的数字平台和信息质量,推动生产经营、商业服务、销售流通等产业活动的便农化;优化乡村生活服务的数字平台和信息质量,推动社区交流、知识获取、就业创业等公共活动的便农化。二是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即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改造乡村传统的水利、气象、电力、交通、农业生产和物流等基础设施,使之适应数字化发展和需求,进而推动乡村智慧水利、智慧气象、智慧电力、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生产和智慧物流的建设和进步。此外,根据《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要求,实践中也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标准建设,包括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等相关标准。

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来看,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利用率不高、不充分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供给侧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效果不尽如人意,需求端农民缺乏数字技能、数字素养不高,整体数字能力不适应于数字基础设施高效使用也是重要结症所在。换言之,农民无法有效分享数字时代的便利和成果,要改善这种现状,长效机制就是积极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塑造数字新农人,使之适应数字时代的生产生活需要,进而提



高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分享数字红利。

## (二)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

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是乡村数字化变革的重点内容。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旨在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信息科技,依托农业生产场域中的传感节点和通信网络,促进智能化作业,提升农产品生产的感知、预警、决策、分析、指导能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科技支撑。当前,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主要体现在智慧农业、乡村电商和乡村新业态等方面。

1.智慧农业。一是建设农业数据资源平台,编制农业农村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整合汇集农业投入、生产、要素、交易流通等基础信息数据资源、开发农业资源决策分析系统;二是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例如种植业数字化、种业数字化、林草数字化、渔业渔政数字化、畜牧业数字化;三是推进农产品加工智能化,通过建设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和智能管理软件系统,更好管控农产品加工风险,提高食品加工质量;四是特色产业数字化监测,积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支持服务;五是农产品市场数字化监测,多维度收集农产品市场信息并利用 App 等数字平台及时发布,为市场监管主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提供决策依据;六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实现农产品流通全程可跟踪,促进绿色生产,确保消费安全。

2.乡村电商发展。一是积极构建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省级电子商务公共平台、县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互联互通、快速协同,为农村电商提供多元化支持服务;二是加大农村电商培训力度,鼓励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积极组织面向农村干部、农民的电子商务专题技能培训,提升相关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商从业能力,增强农村电商发展动能。

3.乡村新业态。一是推动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促进景区设施数字化、运营服务数字化、营销推广数字化、管理数字化,创新旅游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二是探索认养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的智慧化发展,例如田园种植认养、果树种植认养、鱼塘养殖认养、体验式创意农业和消费式创意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线实时消费和体验。

当前,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如火如荼。然而长远来看,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塑造数字新农人。这是因为,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虽然依托先进信息科技,但人作为科学技术的能动载体,是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势能的关键力量,其中,农民是最广泛、最基本的群体。因此,只有切实强化关于农民的数字化培训,塑造数字新农人,积极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才能充分释放科技优势,让数字科技更好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 (三)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

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亦是乡村数字化变革的重要构成。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旨在通过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科技的普惠效应,不断丰富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工具。概言之,是以数字科技作为载体,推进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诸要素数字化的过程和趋势<sup>[70]</sup>。

当前,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主要体现在智慧党建、“互联网+政务服务”、村级事务管理、村级综合治理、乡村应急管理以及数字化惠民服务等方面。

1.智慧党建。一是推动党务管理信息化,将党组织建设、党员管理、民主评议等相关业务网络化,线上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以数字化为手段破解组织涣散、党员流动大等问题,提高党务管理效果;二是大力推进新媒体宣传,运用 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平台积极宣传基层党建等相关工作,数字化传递党组织精神,及时公开党建事务;三是开展党员网络教育,通过学习强国等 App 和相关数字平台推送党务知识、法规制度、党员网课、党内集中教育等模块,针对农村党员干部开设相关专题学习教育,强化农村党员主题教育。

2.“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是大力推动“一网通办”向乡村延伸,将与农民有关的社保、就业创业、医疗保障等重点服务事项优先纳入“一网通办”目录,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二是深化乡村基层综合服务网点覆盖,积极推进乡村数字社区服务器建设,提升乡村综合服务能力,打通乡村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村级事务管理。一是推动“智慧村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和“阳光公开”监管平台建设,提高村务管理信息化水平;二是推进“互联网+村民自治”,不断丰富村民自治方式和渠道,实现村民议事、监督线上线下并行。

4. 村级综合治理。一是强化村级网格治理,健全囊括网信、党建、综治、矛盾调解等在内的网格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度;二是积极建设数据挖掘、智能预警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综治信息化管理平台,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的精准度;三是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数字化,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数字平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5. 乡村应急管理。主要是采用新兴信息科技辅助做好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应对、处置和善后恢复等工作,提升乡村应急管理能力。

6. 数字化惠民服务。主要是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养老”等方面的数字化实践,提升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高品质生活。

从实践来看,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尽管取得了一定效果,然而也遇到了不小阻力。问题存在于财力不足、制度不全、标准缺失、机制不畅,更重要的是,治理主体数字素养较低导致参与程度不高,数字化平台和工具的利用率偏低,特别是不少农民没有及时跟进数字化转型,自身缺乏基本的数字意识、素养和能力,导致无法或者难以有效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亦难以充分享受数字化服务成果,进而降低了乡村治理和服务的效能水平。因此,积极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实践所需,也唯有塑造数字新农人,让更广泛的农民切实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享受数字服务,才能促进乡村善治和服务有效。

##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民数字化转型有其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驱动逻辑。从理论维度来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适应乡村治理的范式转变和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从历史维度来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遵循了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指引。从新中国成立起,推动农民组织化走向农民职业化,迈向农民数字化是党和国家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从实践维度来看,驱动农民数字化转型受到乡村数字化变革的牵引推动。具体包括数字下乡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

农民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农村发展、乡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农民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成败不仅事关能否成功塑造数字新农人,促进农民现代化发展,而且事关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效能。从国家现代化战略视角来看,这也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步骤。当前要积极深入推进农民数字化转型研究。一是要持续深化农民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逻辑研究,揭示农民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路径,不断丰富农民数字化转型的中层理论图景;二是积极探索影响农民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因素,并深刻揭示其作用机理,以期顺利实现农民数字化转型提供智识支撑;三是将农民数字化转型放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探讨其何以作用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及其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相互关系。

## 参考文献

- [1] 武小龙.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J].电子政务,2022(06):37-48.
- [2] 吴业苗.城乡二元结构的存续与转换——基于城乡一体化公共性向度[J].浙江社会科学,2018(04):86-92.
- [3] 文丰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意义、困境及纾解[J].理论学刊,2022(03):133-140.
- [4] 雷晓宁.“农民进城”还是“资金下乡”——谈城乡鸿沟及其政策取向[J].改革,2003(02):27-32.
- [5] 刘骏城.乡数字鸿沟持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10):119-121.
- [6] 闫慧.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及其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J].图书情报工作,2012(06):90-94.
- [7] 闫慧,闫希敏.农民数字化贫困自我归因分析及启示——来自皖甘津的田野调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05):68-81.
- [8] 刘济群.基于核心资本概念的农民数字化脱贫阶段模型分析[J].现代情报,2015(01):21-25.
- [9] 闫慧.农民数字化贫困的结构性成因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02):24-39.
- [10] 吴玲,张福磊.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及其治理[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02):28-35.
- [11] 王凤婷,王浩,熊立春.农村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机制与事实[J].浙江社会科学,2023(08):4-14.

- [12] 张晓杰.数字化驱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J].当代经济管理,2023(03):68-75.
- [13] 梁银锋,王楠.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何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为例[J].电子政务,2024(01):46-62.
- [14] 熊春林,王娅灵.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模型构建与仿真模拟[J].重庆社会科学,2024(04):6-25.
- [15] 水宏,何永林.数字治理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进路[J].湖南社会科学,2024(02):75-84.
- [16] 闫广芬,余静.数字化转型视阈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角色调适、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4(09):50-57.
- [17] 吴合庆,陈桂生.数字乡村共同体建设困境及其进路[J].行政管理改革,2023(11):82-92.
- [18] 陈桂生,徐铭辰.从“转译”到“网络”: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23(04):137-145.
- [19] 刘渊.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内蕴、困境与路向[J].探索,2023(01):102-112.
- [20] 张鸿,王思琦,张媛.数字乡村治理多主体冲突问题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1):1-11.
- [21] 刘少杰,周骥腾.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J].学习与探索,2022(01):35-45.
- [22] 李卓异,赵丹,马书琴.乡村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研究[J].成人教育,2023(12):39-46.
- [23] 苏岚岚,张航宇,彭艳玲.农民数字素养驱动数字乡村发展的机理研究[J].电子政务,2021(10):42-56.
- [24] 苏岚岚,彭艳玲.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农业技术经济,2022(01):34-50.
- [25] 马丽,杨艳梅.农民数字素养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与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2(06):46-54.
- [26] 王小华,黄捷,宋檬.乡村数字金融的幸福效应研究[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7(04):77-91.
- [27] 赵星宇,王贵斌,杨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6):52-58.
- [28] 尹广文.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行动主体激活与培育[J].社会发展研究,2021(04):27-38.
- [29] 文军,刘雨航.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5):62-71.
- [30] 袁宇阳.“大国小农”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表征、实践方式及动力机制[J].经济学家,2024(05):108-117.
- [31] 孔祥智,谢东东.大国小农 何去何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对马恩经典农户理论的拓展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06):1-12.
- [32] 张红宇.大国小农: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抉择[J].求索,2019(01):68-75.
- [33] 王亚华,高瑞,孟庆国.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3-29.
- [34] 曹荣湘.数字鸿沟引论:信息不平等与数字机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06):20-25.
- [35] 胡莹.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审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04):60-69.
- [36] 邱泽奇,张澍沁,刘世定,等.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
- [37] 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03):47-59.
- [38]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02):10-29.
- [39] 史云贵,薛喆.简约治理:概念内涵、生成逻辑与影响因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01):149-159.
- [40] 赵晓峰.中国农村基层的简约主义治理:发生机制与功能定位[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06):127-131.
- [41] 董磊明,欧阳杜菲.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J].政治学研究,2023(01):133-146.
- [42] 欧阳静.简约治理:超越科层化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2(03):145-163.
- [43] 雷望红.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116-126.
- [44] 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J].开放时代,2010(07):73-86.
- [45] 熊凤水,刘银妹.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3(03):115-123.
- [46] 陆益龙.“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J].社会科学研究,2022(03):126-134.
- [47] 冷波.监督下乡:乡村监督体系重塑及其效应[J].中国农村观察,2021(04):79-89.
- [48] 刘志鹏,刘丽莉.“干部下乡”背后的“政策落地”——基于“精准扶贫”中干部互动视角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0(12):112-119.

- [49] 刘成良.精准治理:地方治理的精准转向及其悖论——地方治理能力的视角[J].人文杂志,2020(03):112-118.
- [50] 徐增阳,张磊.公共服务精准化: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4):19-27.
- [51] 王春城.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8(01):51-57.
- [52] 张鸿雁.“社会精准治理”模式的现代性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6(01):12-17.
- [53] 李德满,黄欣荣.大数据时代群体事件的精准治理[J].江西社会科学,2018(02):235-242.
- [54] 谷志军.问责乱象的生成机理及精准治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2):32-38.
- [55] 王泽,贾泽诚.城市基层精准治理的逻辑与路径——基于技术嵌入的理论视角[J].宁夏社会科学,2021(05):173-180.
- [56] 李天宇,章昌平,许鹿.精准治理: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J].公共管理学报,2017(01):1-13.
- [57] 郁建兴,任杰.迈向精准治理:后小康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J].公共管理学报,2022(03):1-11.
- [58] 丁波.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2):9-15.
- [59] 韩庆玲.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J].电子政务,2023(05):38-48.
- [60] 韩瑞波.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132-140.
- [61] 鲍静,贾开.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J].政治学研究,2019(03):23-32.
- [62] 徐旭初,朱梅婕,吴彬.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23(02):16-33.
- [63] 苏岚岚,赵雪梅,彭艳玲.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J].电子政务,2023(07):57-72.
- [64] 黄一玲.生活方式变革与美好生活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5):69-76.
-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195.
- [66] 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18-34.
- [67] 吴毅,吴帆.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1(04):59-84.
- [68] 王杰,丁志刚.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内涵、演化逻辑与实践启示[J].农村经济,2023(10):50-60.
- [69] 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社会学研究,2016(06):119-142.
- [70] 冯献,李瑾,崔凯.乡村治理数字化: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J].电子政务,2020(06):73-85.

## Shaping Digital New Farmers: The Driving Logic of Farm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ANG Jie<sup>1,2</sup>, MEI Lianghao<sup>2</sup>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s a key measure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s the proper meaning of building a good digital countrysid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s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mallholder farmers to digital new farm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essence and logic of farmer modernization remain unchanged, whi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re highlighted. To be specific, driving farm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its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requires the inherent drive of farm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dapt to the paradigm shift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s a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farmer organization to farmer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farmer digitalization, following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is driven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such as dig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igital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rural governance and service digitalization. The above three driving logic, its common direction is to shape the digital new farmers.

**Keywords:** digital new farmer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ing logic; rural digitization; peasan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张洁)